

歐洲舊「法西斯主義」：政治福音與集體癡狂

王皓昱*

- 一、前言
- 二、歐洲極右翼政治勢力
- 三、政治福音誕生的社會背景
- 四、極端排他的政治信仰
- 五、極權政治的典範
- 六、癡狂與黷武：人爲的大災難
- 七、結語

法西斯主義在歐洲陰魂不散，以「新法西斯主義」轉世再生。「法西斯主義」(Fascism)本有正義及秩序之涵意，但後來卻成了社會不安及危險思想的代名詞，因為它會終結自由及民主政治，進而形成獨裁與極權政體。歐洲舊法西斯主義所留下的政治見證是：它可以極短的時間，在一小撮煽動暴民的浮誇演說家的導引下，吸引群眾鄙視理性、盲信主義，進而迅速有效地奪取政權；從此，政治上揚棄民主走向獨裁與極權，不僅對異己蠻橫暴劣，同時也有仇外的氣焰；結果，法西斯主義運動極其窮兵黷武地震撼了全球。至今在歐美社會中，法西斯主義仍被一股政治勢力奉爲中心信仰，但爲國內研究當代歐美政治思潮及政治社會現象者所忽略。本文研究的動機及其主旨即在於提醒人們應重視這個本世紀顛覆歐洲的「政治福音」及其所造成的荒謬現象，並以一九二〇年到一九四五年義大利和德國信仰法西斯主義的政治社會與心理現象，來佐證政治福音的力道，及其可能造成的大災難後果。

關鍵詞：政治福音、法西斯主義、急進的極右翼勢力、煽動暴民的演說者、全民的共同體、種族中心主義、反猶太主義、極權統治。

*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專任副教授

一、前言

自古以來，人類就生活在各種時弊及挫折煎熬的環境中，因此極希望從貧窮的環境、壓制的制度以及連年的戰禍衝突桎梏中解脫出來。而滿腹經綸的思想家及充滿使命感的政治領導者，就研擬「政治配方」(*Political formula*)以滿足社會群體的需要。「政治福音」就是滿足社會整體的心理需求，並為追尋完美社會的政治行動辯護的一套信仰說詞。因而政治福音在不同的處境有不同的功能：它可以是在野勢力徹底推翻現有體制的救世說法；它也可以是統治者為鞏固政權，激勵人民齊心努力追逐理想國的福音。¹

法西斯主義就是一次大戰後，歐洲國家內部為拯救社會而出現的新政治福音。但是這套福音，就好像亂開藥方、用藥不當一樣，導致人性本身就存在著毛病的人類，出現集體癡狂、窮兇惡極的症狀，同時也充分暴露了人的原始本性。在「新法西斯主義」到處被宣揚的今天，吾人尤應調閱病歷紀錄，認識亂開處方的政治後果。

二、歐洲極右翼政治勢力

在二十世紀的主要意識型態中，唯有法西斯主義是在本世紀才出現(Sternhell,1987:148)。法西斯主義(Fascism)在政治思想上被歸類為是好侵略的國族主義(*aggressive nationalist*)，及反共又反自由的極權政治哲學，在政治光譜(*political spectrum*)上是屬極右翼(*extreme, far, radical, right-wing*)的反動勢力(Krejčí,1991:1-18; Baradat,1991:20-48; Kitschelt,1995:29-45)。

法西斯主義(Fascism)一字的來源：一是拉丁文“*Fasces*”意指「權杖」，是古羅馬執政官的權力標誌，是公權力、正義及統一的象徵；另一是源自義大利文“*fascisti*”，意指「團隊」，即指致力於團結與戰鬥的法西斯，因此也有團結與行動的涵意。²但在研究政治思想的習慣用語中，法西斯主義不僅是指義大利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 1883-1945)所創立之「法西斯黨」(*Partito Nazionale Fascista, PNF*)的主張，同時也包括了希特勒(Adolf Hitler 1889-1945)時代德國「納粹黨」(*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National

1 有關政治福音，請參本文作者的相關論文：王皓昱著「追逐理想國：政治福音的功能」，東吳政治社會學報，第十三期，民國七十九年三月，頁117-151。

2 法西斯概念最早傳入我國時，有許多不同的譯名：如「汎擊黨」、「棒喝團」、「黑衫黨」等。請參周毓英著「法西斯蒂與法西斯主義」(民國二十三年著)，收編於：周毓英編譯《法西斯主義的理論基礎》，台北：帕米爾，民國六十六年年初版，頁1-32。

Socialist German Workers' Party, Nazi Party)的「國家社會主義」(National-Socialism)，以及多少受他們感召的政權：如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 1892-1975)時代的西班牙、薩拉查(Antonio Salazar)時代的葡萄牙等所崇信的政治信仰。從三十年代開始，繼義大利墨索里尼獨裁及德國希特勒的後來居上，儘管政綱上存在著差異，幾乎每一個歐洲國家都有崇尚法西斯主義的政黨。³而法西斯主義的思想在戰後的歐洲民主社會中，也從未斂跡，如同宗教迷信，被社會部份群眾奉為中心信仰，同時也是一股社會不安的力量。⁴以後，甚至在中南美洲阿根廷、秘魯、玻利維亞、巴拉圭、烏拉圭、多明尼加等地均有軍人法西斯政權接踵效尤、長期獨裁的經歷。今天不僅在歐洲各地，甚至在北美、澳洲、南非及俄羅斯等地，新法西斯主義仍然是不容忽視的政治勢力。

在思想的歸類上，吾人沒必要去推翻這個維繫已久的習慣用法(Touchard, 1981:802)。但必須指出的是：法西斯主義運動或政黨在各國出現時，雖顯示出頗多的共同特徵，然亦有其明顯的差異⁵。法西斯主義是明顯地隨國家的不同而有其特殊風貌。納粹主義與法西斯主義都堅守著當時歐洲極右派的主張：民族主義(nationalism)、殖民主義(colonialism)及種族主義(racialism)，同時也鄙視自由、平等的主張及議會政治(anti-parliamentarianism)，進而頌揚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精英主義(elitism)、軍國主義(militarism)及帝國主義(imperialism)；就其反對知識與理性的作用而言，都帶有浪漫主義的色彩；同時也不同程度地引入集體主義(collectivism)，並推行行會主義(corporatism)的經濟組織。因此，法西斯主義以專制政治起步後，很容易跌入極權政治：義大利與德國就是典型的例子。但它們在這些相同的基礎上，還是有不少差異：尤其是希特勒將種族主義發揮到極端恐怖的地步，而墨索里尼則有所保留；再者，它們終究是在二個不同的社會環境中成長，因此必然會表現出不同的規模與風貌。有時為了明確辨別某些差異，必須以「納粹主義」(Nazism)來指陳法西斯主義的極致——希特勒時代的德國。

³ 有關法西斯主義在歐洲各地的興張，請參：F.L.Carsten, *The Rise of Fasc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econd edition, 1980。

⁴ 有關歐洲新右翼勢力，請參：Hans-Georg Betz, *Radical Right-Wing Populism in Western Europe*, London: Macmillan, 1994; Herbert Kitschelt, *The Radical Right in Western Europe*, Ann Arbor(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5..

⁵ Maurice Duverger就想從獨裁現象做理論上的歸類。Duverger分出所謂「社會學上的獨裁」(*dictatures sociologiques*)、「技術性的獨裁」(*dictatures techniques*)以及「父道主義家長式的獨裁」(*dictatures paternalists*)等類型。技術性的獨裁是指一小撮野心者奪權鬥爭後的獨裁，並不是因為社會結構問題所造成；社會學上的獨裁類型則是指因政治、經濟以及信仰等社會危機所造成的獨裁，且依其是否要維護舊有秩序或帶動一新秩序，而又有保守或革命之別。Duverger認為希特勒與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體是屬社會學上的保守獨裁型，而將佛朗哥與薩拉查歸類為「父道主義家長式的獨裁」(Maurice Duverger, *De la Dictature*, Paris: René Julliard,

三、政治福音誕生的社會背景

事實上，法西斯主義或是納粹主義最先都缺乏一套完整學說。大體而言，法西斯主義是先有運動而後添加理論，且以實驗主義自許(浦薛鳳，1963:112；Baradat，1991:225)。法西斯主義的政治勢力成長過程，略可分為三個階段：首先以推展運動的方式出現，並與其他民族主義愛國運動團體匯合；之後，鞏固成法西斯黨，極力地想成為執政黨；當取得政權後，法西斯政黨立即廢除政黨競爭，形成「一黨專政」的局面。

探究法西斯主義運動的早期主張可發現：理論基礎雜亂而且政綱不明，甚至有隨機應變的機會主義特色，但都強調行動與紀律。墨索里尼就一再強調行動勝過諾言，而且法西斯主義的實踐，需要的是紀律而不是教條。墨索里尼不僅在一九二一年三月在義大利組織法西斯政黨時如此主張，甚至到了一九二四年仍再次強調：「法西斯主義者有勇氣抗拒所有傳統的政治理論，同時也揚棄教條化的計劃...，視時間、地點、環境條件的不同，會成為貴族主義者及民主主義者、保守者及激進者、反動者及革命家、無產階級及反無產階級、和平主義者及反和平主義者。重要的是要有既定的目標：那就是國族至上」(Albertoni, 1981:121)。對「阿爾卑斯山以南的偉人」有熱烈欽慕感的希特勒也認為重要的是人的意志，他所著的《我的奮鬥》(*Mein Kampf*)一書就是行動的呼籲，而不是學說性的論著。從這本納粹德國的「政治聖經」中可看出：希特勒是著魔於某些深信不移的理念，但不是一位理論家。墨索里尼雖也寫了《法西斯主義的理論》一書，但完全是一本宣傳用的小冊，勉強三十頁的篇幅，只是表達了反一切當道學說的概念。⁶

研究法西斯主義及國家社會主義的主張，不如先透過政治社會學的分析，來探研這股勢力及其理論興張的社會背景：

像墨索里尼所一再強調的，法西斯主義是時代危機的產物。一次大戰後的德國，因戰爭的失敗、領土的喪失、政體的改變、鉅額的賠款以及一連串經濟災難的打擊，使得國家處於崩潰之境。戰爭的失敗與恥辱感，使得受屈辱的民族需要精神的慰藉。德國人認為自己是不公平的犧牲者，尤其對於列強以凡爾賽條約施加在德國身上的恥辱難以消受。而義大利雖渡過戰爭的考驗，但卻是「和會的失敗者」，義大利除了賠上百萬人的生命，並造成國家財政枯竭及社會動亂外，幾乎一無所得。

1961)。

⁶ 希特勒《我的奮鬥》一書，本文根據：Adolf Hitler, *Mein Kampf*, New York: Reynal and Hitchcock, 1939 (The German original: Munich 1925, 1927)。墨索里尼《法西斯主義的理論》一書，本文則依據：墨索里尼著·錢九威譯，《法西斯主義：理論及制度》，台北，帕米爾，民國六十六年台初版，頁1-30。這本書中的「制度」部份是譯者將義大利法西斯政權所頒佈的法令予以編纂而成。

法西斯主義也是經濟情勢不斷惡化所引發的思想。戰後的失序造成了物資匱乏、通貨膨脹、人民失業、生活貧窮及出現飢荒等哀鴻遍野的「經濟大災難」。⁷像德國到了一九三二年，失業人數近六百萬人。承續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論戰，不少人不僅反對階級鬥爭的政治野心，並痛恨資本主義謀利、腐化的自私邏輯，同時對工業進步會造福人類的神話也深感失望，因為自由主義的經濟競爭，反而加劇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階級剝削與對立，而且工作也變得極不人道。

畏懼(*les craintes*)的心理也是促成法西斯主義出現的重要原因。當時，俄羅斯布爾什維克革命的成功震撼了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令工商鉅子及大地主們對左派的竄紅感到無比的威脅。無論自由主義或保守主義者都致力聲討馬克斯社會主義的國際主義及階級鬥爭主張，認為階級敵人的樹立，造成國家社會內部的不安與發展的停滯。

再者，人們普遍對民主政治的喧鬧、腐敗、貪贓等亂象極感不滿，對統治階層也失去信心。由於認為國家社會畸形發展的結果，反自由、反民主及反議會政治就成為不少政治學派及政治勢力的主張（如義大利精英學派及各國保守、反動勢力）。戰後的德國於一九一九年揚棄帝制走向共和，體驗首次的民主政治經驗——「威瑪共和」(the Weimar Republic)。但當時不少人質疑威瑪共和的體制，不僅對民主政治缺乏認同感，同時對統治階級的無能存有鄙視的心態，因此老百姓仍普遍懷念往日帝國的光榮及威權的領導(Geary, 1993:13-36)。希特勒就認為慕尼黑市場裡的每位婦女對政治的了解和威瑪那些領導人一樣多，議會中也只不過是集合了一群卑鄙而又無能的人士。當時義大利雖然渡過一次大戰的考驗，然民族主義者認為軟弱無能的統治者及喧嚷的議會政治造成了國家聲望的低落及「和會上失敗」的後果；長久以來，人民渴望恢復往日義大利盛況的願望一再成空，使得累積的屈辱感只有宣洩到統治階層身上。因此，在復興民族運動的鼓舞下，議會政治被指責是虛偽的資產階級民主，認為只有恢復政府權威、推翻庸俗的民主政治，才是建立一個新國家、新秩序的開明走向。

戰後的退伍軍人在當時也處在憤怒與失序的局面，自感被社會忽視並被政客所背棄。退伍軍人就成了法西斯主義及國族社會主義發展之初期的核心分子。此外，狂熱、急進的民族主義者、理想主義者，或是不滿現狀的白領階級和失業的勞工等等，都叫囂著不滿，極度不耐煩地等待著社會徹底的變革。

當時，歐洲大陸社會也瀰漫著一股沒落感。雖然理性主義當道，但是道德與宗教價值皆處在流失與衰竭的局面，且有世風日下的苦惱與不安。受到史賓格勒(Oswald Spengler, 1880-1936)等人的警惕，也流行著防衛歐洲文明疆界及優越地位，以對抗亞洲及有色人種侵蝕的學說。

⁷ 以通貨膨脹為例：一九二二年十月時，一美元約可兌換4,500馬克；但在一九二三年十一月，竟可兌換4,200,000,000,000馬克(Carsten, 1980:108；Fulbrook, 1992:34)。

總之，大戰的挫敗與國勢的頹萎，以及對未來的不確定感等，使得人們對未來滿懷著不安與恐懼；社會經濟的困境也使得人們普遍對自由主義的經濟理想與信心破滅；此外，在共產主義的革命威脅、殖民地的喪失以及總體戰的備戰氣氛等諸多情勢的圍剿下，舊秩序搖搖欲墜，人們等待新力量及新的「政治福音」導引。這種社會情勢也使得絕對自我中心的民族，在自卑而又自大的心理矛盾下，激盪出一種挑釁、侵略而又情緒化的民族主義「仇外精神」(Xenophobia)及黷武的「沙文主義」(chauvinism)。

四、極端排他的政治信仰

法西斯主義就是滿足社會集體心理情緒的產物。法西斯主義如同其他各種政治思想，有使國家強大的承諾。希特勒就強調：「法國革命與俄羅斯革命成功的秘訣，即在於提出了偉大的新思想，而法西斯主義也完全是由理想發生力量，法西斯主義以最造福於人民的方式致力於民族的復興」(Hitler, 1939: 784)。

法西斯主義的倡導者是社會現況的反叛者，並為社會群體的挫折與茫然於未來的心理抒情。法西斯主義的主張表現出極端狂熱、偏激的「愛國精神」(patriotism)與民族主義風格，同時也將這種對國家、民族的熱情，毫無忌憚地宣洩在窮兵黷武的軍國主義侵略行動上。法西斯主義在歐洲起家、登上統治者的寶座並未靠武力達成，而是透過密集的宣傳及對自由主義及馬克斯共產主義的討伐而異軍突起。

殘酷的現實造成人民病態性的不滿，每個人都懷著極端的恨意及過高的期望。人們把他們最後的希望全部寄託在那些誇下所有承諾的「煽動暴民的演說者」(rabble-rouser)身上。事實上，他們最大的本領都是善於運用文字和語言來操縱群眾，把演說當成對話，懂得如何煽起聽眾的情緒，當聽眾表現出讚許的舉動時，他們就迎合著重複加以發揮。⁸法西斯主義運動的推動者針對國人的恐懼感、偏見心理以及普遍沮喪的情緒，提出一些偏執、浮誇、非理性、甚至荒誕的主張，並以煽動的說詞佈道，讓人民將希望寄託在反動又好戰的新力量、新制度和新的政治行動上。他們利用人民思想、生活、情感中的普遍弱點，簡化生活上令人慌亂的複雜問題，將所有的責難歸咎於一種原因（如某一種族或敵對的意識型態），而無力辨別的群眾不僅簇擁支持，同時也陷入集體「盲信」(fanaticism)之境。

事實上，在法西斯主義運動快速膨脹，需要明定政治戰略並安撫熱情激昂的群眾時，法西斯運動的領導者經常處在慌亂、困惑及猶豫不定的窘況，面對集體愚化的浮躁

⁸ 對自己演說的能耐頗感自傲的希特勒就強調：為感動群眾，演說的時間最好是選擇在夜幕低垂之時，因為此時聽眾精神疲倦、頭腦遲鈍，意志與抵抗力也有所減弱。他把這種人工的安排，與進入充滿香燭氣息、光線晦暗神秘的天主教堂的效果相比(Hitler, 1939: 710-711)。

群眾，領導者只有引領百姓任情、任性地奔放到荒誕的境地。

無論墨索里尼或希特勒均無高深的學問，他們大部份的原則是因應不同問題的過程中，吸取當時所能參考及贊同的主張（無論是左派或右派）拼湊而成：如穆拉斯(Charles Maurras, 1868-1952), 索瑞爾(Georges Sorel, 1847-1922)與列寧(Lenin, 1870-1924)等人的理論，並借用德國唯心主義者黑格爾的倫理國及尼采之權力意志及超人等概念，並對當時西方文明的一些根本原則如人類平等、自由權利、理性主義、客觀真理及追求和平的願望等採鄙視、排斥的立場(Chevalier, 1962:1519-1521; Sabine, 1973: 799-801; Baradat, 1991:228)。

因此，法西斯主義的政治有反動的特質。像墨索里尼在一九二一年時宣稱：「這是一種極端右傾反動的宣言，法西斯主義是反個人主義、反議會政治、反民主政治及反馬克斯社會主義的產物」(Lavroff, 1978:116-117)。雖然法西斯主義也有社會主義的均富理想，但卻叛離了唯物主義思想的辯證路徑，轉向以唯意志論及行動哲學為基礎，企圖藉助「新覺悟、新信仰和新意志」，建立一種新的理想國與新的文明。

法西斯主義者深深受到工團主義思想家索瑞爾(Georges Sorel, 1847-1922)的影響，在政治行動上，強調暴力的效用及政治「神話」(myth, 或音譯為「迷思」)的指引。神話是行動的依據，是致力推翻現有體制的決心，是啟發及推動戰鬥的勝利影像。神話雖不理性，但有百利而無一害，在革命行動中是必備的武器。索瑞爾在《對暴力的感想》(*Réflexions sur la Violence*)一書中，一再強調：一切革命行動必須建基在，承諾徹底掃除社會一切疾苦的神話上；如無神話的激勵與鼓舞，人民是不會有自發性的革命行動(Sorel, 1907:38-42)。希特勒也比照宗教神話，進而認為政治信仰要有排他性，因為「狂熱的排他性才能夠創立萬古不滅的信仰，這是宗教存在的絕對必要條件」(Hitler, 1939:675)。

法西斯主義就是一種「神話」，一種浮誇不實、想像、虛構的新福音。墨索里尼等不時地高呼「我們創造了我們的迷思，那就是國族至上」。法西斯主義者認為民族的存續才是一切問題考量的根本所在。雖然近代英、法、美等國的政治理論是建基在個人主義的基礎上，但法西斯主義的宗旨之一，就是要徹底改革十九世紀以來飽受自由主義及社會主義衝擊的歐洲政治社會，揚棄個人主義，而高頌民族至上、國家至上。對法西斯主義者而言，民族並不等於它的組成成員，它不僅只是個人的集合體，或僅指那些活在世上的子民；民族是承先啓後、繼往開來的，是祖先及後繼子孫的集合體。法西斯主義者認為民族就是一種迷思，民族就是力量，而且是一種精神力量，非理性地、感情地驅動並激勵人民，是人民情感認同的重心，對於「血統與鄉土」的永恆情感，正是民族認同的親切表現。而國家的責任就是要保障民族社會的政治秩序與生存。

承襲亞里斯多德等人的概念，法西斯主義者認為「人是政治的動物」，即人必須生

活在政治社會中；群體生活的發展進化到國家是最高及最佳型態，人民從國家得到自由及自由權利的保障。國家有其生命與靈魂，國家是社會生活和精神價值的塑造者及保護者，國家的道德意志導引人民過有德行的生活。希特勒對國家的界定是：「國家是一個具有民族性的有機體，它的使命是維持民族之生存，激勵民族精神與理想之創造，並進而促使全民族達到自由的最高境界」(Hitler,1939:595)。因此，國家的角色就是在結合不同階級，致力達成道德與精神目的，國家是強者的工具及弱者的保障，是人民的意願及良知的表現。

接受法西斯主義或國家社會主義信仰的同時，彰顯出人民對馬克斯唯物主義、自由主義和民主政治的混亂、以及對利己的資本主義的生產體系的排斥(Sabine,1973:804)。法西斯主義者認為無論自由主義及社會主義的政治理論都源自法國大革命的傳統。希特勒就提醒德國人：近二個世紀來，德國就是被這些外來學說所顛覆，而猶太民族就是所有外來學說及企圖由內顛覆破壞的總代理。在納粹份子的字彙中，不僅將大戰戰敗的重要原因歸咎於猶太人及馬克斯主義信徒的從中破壞，造成國家分裂及整體力量衰竭；同時將「猶太」與平等主義及馬克斯主義劃上等號，因為無論是自由、平等的主張，或是馬克斯主義以及攻擊國族與種族的理論，都是「潛伏在國內的最大敵人」、「吸血鬼」——猶太人的學說。希特勒治療創傷的最佳作法就是推脫責任，並對歷史進行報復，首先必須從廢除凡爾賽條約對德國的不公正待遇做起。希特勒就是在人民響應的氣氛中展現其野心。

當時俄羅斯式的布爾什維克革命也深深威脅著歐洲國家，希特勒認為「德國是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第二個大目標」，因此高呼為防範赤化的災禍而戰(Hitler,1939:961)。法西斯主義者認為每一民族都有自己的社會主義，由於馬克斯是寄住在他國的猶太人，因此有意忽視民族的情感，叫囂著階級鬥爭以進行分化和顛覆。對法西斯主義者來說，「真正的社會主義」信仰者並不是唯物論者，而是理想主義的唯心論者(idealist)：他們反對階級鬥爭的主張，改以民族的大團結來號召人民，並期望新社會將是一個「全民的共同體」(*Volksgemeinschaft*; people's community)(Geary:1993:47-48)。⁹因為只能靠著民族大團結的力量才能在這混亂的世界中求得生存。希特勒等進而認為，要替繁殖的人口找尋工作和麵包，即為生存而奮鬥，最健全的途徑還要進行開疆拓土的征服。因為國家的責任就是在追求民族「生存空間」(*Lebensraum*; living space)的擴張；不能擴展生存空間的國家，最後必然趨於衰亡。墨索里尼及希特勒都一再強調：怯懦的民族在這世界上是不配生存的，必須要為鞏固其世界的宰制地位而鬥

⁹ 這是德國社會學家圖尼斯(Ferdinand Tönnies,1855-1936)的「共同體」概念：從「有機意志」(*Wesenwille*:實指本能的自然意志,情感的實體)出發，形成有血緣、鄉土及精神「歸屬感」的共同體(*Gemeinschaft*)。它是與「思慮過的意志」(*Kürwille*)所形成的利益交換「社會」(*Gesellschaft*)完全不同。

爭，以便「最高貴的民族」能享受次劣種族的服務。希特勒認為德國要實現健全的疆土政策，除了將所有德語系國家予以統合外，必須在歐洲獲取新的領土(Hitler, 1939:168-181)；而納粹的盟友墨索里尼則主張，繼續在北非等地開疆闢土。為此，軍隊就成為訓練優秀民族的學校。

至於對自由主義的討伐，法西斯主義者的辯解是：自由主義的發揚結果，使得任何荒謬的蠢事都成為可能，容許最下流無恥的人領導國家，國會中也充斥著一批卑鄙而又無能的小人。他們認為自由民主政治的荒謬即在於任何愚夫及社會的寄生蟲都有批評的權利及從政的資格，因而政治就變成與低能者進行妥協的活動，結果，「代議民主只不過是代表了大多數人的愚蠢與怯懦而已」，使得社會根本無正義與公道可言，最後造成社會的無政府狀態：人們賣弄謊言，摧毀傳統道德價值，並模糊了好壞的界限；經濟上的自由則任由人們成為拜金主義的奴隸，為唯利是圖的私利而破壞社會整體利益。墨索里尼在《法西斯主義的理論》這本小冊中，就一再譴責物質主義當道，使得經濟社會僅僅成為鬥爭的場所。法西斯主義者對當時人道主義政策也極力譴責，認為小氣過火到根本無力承擔其吝嗇的程度，只是推行有如照顧動物般的福利政策而已。

由於法西斯主義反民主、反議會及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則，同時認為多數決的民主政治與議會政治是政治中的最壞與最庸俗的型態，因此主張權力必須由一小撮人掌握，並在領袖(*Il Duce; Führer*)的獨裁及英明的領導，來替代民主政治的運作。希特勒以及曾是社會黨黨員的墨索里尼就指責：馬克斯主義歷史唯物論的荒謬，即在於它揚棄了「自然界的貴族原理」，否定了「世界的演進是決定於精英的行動」(Hitler, 1939:83)。但在精英主義的原則下，墨索里尼強調的是統治者的責任；而反平等的主張在納粹主義中則提昇到荒謬與自大的境界。希特勒雖也倡言強者的角色在於統治而不是與弱者融合，但希特勒更致力於宣揚亞利安人(Aryan)的優越，以及日耳曼民族的歷史使命。使得納粹主義的特殊性即在於它的「極端民族主義」(hyper-nationalism)特質，¹⁰即極度頌揚「種族民族主義」(racial nationalism)，標榜種族的優越及其歷史使命。至今這種種族偏見在歐美各國仍擁有廣大的信徒，強調亞利安人或條頓人(Teuton)乃是世界最高貴的血統，¹¹同時也是世界文明的支柱。義大利及西班牙等地的法西斯主義，尚不至於像希特勒納粹黨那樣患了種族主義自大症，也未進行大規模的迫害運動。

由於法西斯主義是滿足集體心理情緒的產物，因此必須為社會群體的挫折與茫然於未來的心理抒情，尤其在社會失序的情勢下，必須振興紀律及秩序。法西斯主義將社會

¹⁰ Roger Griffin則稱法西斯主義的特色即在於「一種民粹的極端民族主義再生形態」(a palingenetic form of populist ultra-nationalism)(Griffin, 1993:26)。

¹¹ 一般習慣上，Aryan, Teuton, Nordic互用。

主義的理想與強調紀律和權威的普魯士及羅馬傳統結合，以行動、冒險及尚武精神來號召頹廢的百姓，並藉助美麗的憧憬及尚武的體育與戶外活動來激勵處於死氣沉沉及「混亂」(*anomie*)情勢的青年士氣。法西斯主義的神話提供了人們舒暢積怒，並讓壓抑的行動能自然奔放的機會。

總之，法西斯主義是一種恐慌的產物：追殺所有被認為對社會有害的敵人，同時又幻想完美、重歸自然及無缺點的社會。尤其納粹的意識型態完全是建基在被攻擊的幻想上。日耳曼的傳統社會是一層級化的社會，而且德國人對威權統治以及對軍國主義戰鬥榮譽心的偏好，使得只有靠戰爭才能允許人們展現實力(Meinecke, 1967:39-50)。因此，戰爭與征服就成了法西斯主義新歐洲社會的前奏。

但是法西斯主義的內容，不能僅僅簡化為墨索里尼及希特勒的政治主張，最重要的內容是實踐的後果。法西斯主義的原則或主張，遠不如人民能夠長久麻木不仁地容忍這種體制，並效忠那些危險的獨裁者的現象來得重要；而且領導者的反常及所犯下的罪行，也遠不如老百姓授予他們全權來得重要。¹²因此研究法西斯主義，尤其不能忽略了被統治者——人民的響應，及領導者所享有的特殊威信(*Charisma*)。因為群眾的盲信與效忠充實了法西斯主義。

五、極權政治的典範

一九一九年起，墨索里尼在義大利推展法西斯主義運動，當時參加米蘭誓師大會者不到二百人。之後，在恐懼左派勢力高漲的大地主、工業鉅子以及軍人的支持下，法西斯運動風潮迅速擴散。一九二一年時，墨索里尼所領導的法西斯組織在國會已擁有三十五席，同時深深吸引了中下階層的老百姓，墨索里尼也趁機重組全國各地的工、農團體。一九二二年，墨索里尼將法西斯運動所形成的各組勢力，整合為擁有三十二萬黨員及二千三百個地方支部的政黨(Carsten 1980:49-60)。同年，墨索里尼藉社會逼近癱瘓的危機時刻，高呼政府應將權力交給法西斯黨，並以「向羅馬進軍」要脅。只靠著這種聲勢的威脅，國王伊曼紐爾三世(Victor Emmanuel III)邀墨索里尼組聯合政府。因此「黑衫黨」未開一槍就控制了義大利政府，三十九歲的墨索里尼成了義大利有史以來最年輕的總理。

反觀希特勒，一九二〇年起就控制了由一些反猶太、反馬克斯的民族主義團體所組成的納粹黨。一九二三年時，該黨就已聚結了五萬五千名頗具侵略性格的納粹份子。同年，在慕尼

¹²有不少書，如法國名醫François Bayle,在其《國家社會主義的心理行為及倫理》(*Psychologie et Ethique du National-Socialisme*, Paris:P.U.F.,1953)一書中，就致力描述統治階層太多是一些極為腐化、墮落或是生理精神上的失常者。

黑企圖發動政變失敗後，希特勒入獄，在其秘書Rudolf Hess的協助下，口述其大作《我的奮鬥》。希特勒出獄後重組納粹黨，單其武裝衛隊——「衝鋒隊」，在一九三二年時，遽增到三十萬人，而且大多是失業者(Carsten,1980:139-140)。一九三三年的國會改選，納粹黨獲得勝利，¹³希特勒被興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1847-1934)元帥任命為總理。一九三四年八月，興登堡總統逝世後，希特勒立即揚棄威瑪共和體制，實行新的「元首制」，並享無限制的權力，同時宣佈新德國為「第三帝國」(the Third Reich)，且以納粹黨的卍字旗替代原來的共和旗(Shirer,1960:226-230)。¹⁴

法西斯主義的徹底落實必將國家導入極權統治。因為法西斯主義強調「國家統治」(Statocracy)，因此社會中一切事務都受到國家的宰制。事實上，法西斯主義的本質就是極權主義，而且是從理論到實踐過程中的一致主張。因為法西斯主義者認為國家權威的性質就是絕對的、不妥協的、無條件的；為了政治社會的統一與鞏固，國家意志的表達應是全面的，即無論是經濟或宗教等事務都受國家之干預，極權化的國家不僅監控個人及群體的一切活動，同時也不容許權力的分立，以及反對勢力的存在。

Carl J.Friedrich及Zbigniew K.Brzezinski合著的《極權獨裁與專制統治》(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一書中，¹⁵所歸納出的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六點特徵，正是法西斯主義的寫照：(一)有一官方的意識型態，即一套宰制生活各面向的官方學說；(二)由一位獨裁者(dictator)主導，行一黨專政；(三)有一監控百姓生活的公安體系；(四)宣傳工具集中控制；(五)同時也控制了所有的武裝部隊；(六)中央管制經濟。而鄂蘭(Hannah Arendt)在《極權主義的源起》(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一書中則認為：墨索里尼雖嚮往「極權國家」，但不像納粹國那麼極權，只是達到近似極權體制的專制統治狀態；而法西斯主義中最偏激、特殊的類型——納粹的國家社會主義，則與史達林主義的表現極為相像(Arendt,1951:303-304)。

實踐上，法西斯主義的意識型態成為宰制社會各面向的唯一學說。由於法西斯主義仰賴全民族一體的力量來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因此敵視製造社會仇恨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主張；同時全民的社會主義思路，必然也反對造成社會貧者愈貧、富

¹³ 事實上在一九二八年五月，納粹黨在491席的國會中僅僅12席；一九三〇年九月增加到107席；一九三二年七月增加到230席。

¹⁴ 「第三帝國」承續中古時代日耳曼人的「神聖羅馬帝國」(第一帝國)以及一次大戰前的德意志帝國(第二帝國)。納粹黨旗紅底白圓面，中有黑色卍字。此字在德文中讀*swastika*，來自梵文：在古印度象徵太陽，且有福報之意。德國納粹黨藉以象徵亞利安(太陽)族的德國人。

¹⁵ Carl J.Friedrich and Zbigniew K.Brzezinski,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pp.9-10. 有關法西斯政體之運作，請參：朱庭光主編，李巨廉·陳祥超·孫仁宗等合著《法西斯體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初

者愈富的自由主義及唯物、利己的商業文化。因而法西斯主義主張，以利害與共的生命共同體精神，取代原先維護資產階級金權政治的虛假自由主義，以及製造階級仇恨的馬克斯共產主義；在國家的領導下，推行計劃經濟與工團組織，以及政治優於經濟的決策，進而實現民族的大團結及全民均富之理想。

事實很明顯，那就是法西斯主義者所宣稱的「真正的社會主義」，完全是戰術和口號上的考量，是一種「高貴的謊言」，或是吾人所稱的「政治福音」。事實上，義大利的法西斯黨及德國的納粹黨從未傷及權貴及大資本家的既得利益與權勢；而且它們之所以能快速有效地奪取政權、控制政府，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獲得了工商鉅子及大地主等所給予的支持(Kitchen,1976:46-47)。所以新馬克斯主義學派的學者，如布朗雅斯(Nicos Poulantzas)在其《法西斯主義及獨裁》(*Fascisme et Dictature*)一書中也強調：「法西斯主義是資本主義社會進化為帝國主義的另一種特殊類型」(Poulantzas,1974:13-22)。

不同的是，法西斯主義的經濟體系，不再是所謂自然法則下的自由競爭經濟，而是由國家來全盤主導，任何經濟組織與職業組織都被看成國家組織，由國家集中監控。國家不僅指導經濟生產體系，而且要帶領「勞資合作」，以消弭階級鬥爭並調和全民利益，因而以「組合國家」(the Corporate State)見稱於世。像義大利就將全國經濟組織，規劃為廿二個全國性組合，由勞資雙方參加，並接受黨、政機構的指導。從此資方不得以停工要脅，勞方亦不得以罷工為威脅。¹⁶事實上，這種理念緣自「行會主義」(corporatism)。行會本指職業組群的組織，但「國家組合主義」(*le corporatism d'Etat*)則指：國家為致力排除階級鬥爭及資本主義所導發的惡性競爭，在不同行會(同業工會)間，擔任經濟活動協調者的角色。而且，國家本身就是全國各行會組合，行會也變成國家的行政機構。在這種國家工團制度的最高層，是由各行的代表組成委員會領導，而且受黨的指示行事。因此，法西斯的組合主義就是「國家控制」，同時也侷限了各種自由，尤其是經濟自由(Touchard, 1981: 811-812)。葡萄牙的法西斯政權的領導人薩拉查則指稱這是一種新民主政治的表現：「有機體的民主政治」(*democratie organique*)(Millon-Delsol,1991:151)。

但是這種號稱有機體的國家，為了實現全民一體、福利共存的理想社會，僅容許由法西斯黨來「一黨專政」，同時以「以黨領國」來保障社會內部的團結。聲稱唯一代表全民利益的黨是國家命運的主宰，同時也是國家與社會的聯繫組織，在政府與人民間發揮調節作用。黨也是「領袖」獨立用的統治工具。在領袖的獨裁領導原則(*Fü*

版。

¹⁶有關墨索里尼的組合主義概念與組合制度，請參：墨索里尼著、錢九威譯，《法西斯主義：理論及制度》台北：帕米爾，民國六十六年台初版，頁6-7，頁31。

hrerprinzip) 下，黨負責全方位地監控社會。黨必須掌握一切宣傳和教育工具，將領袖的思想和意志，化成人民的思想與意志。神格化的領袖位居在金字塔型組織結構的至高點上，是全民意志的代表及一切行動的總指揮。

一黨專政的法西斯黨是精英式政黨，在領袖的領導及近乎軍事化的組織管理下，強勢地導引國家的行動。但法西斯主義者強調國家的管理權不應委託給某一階級，而應從全國民眾中，甄選出有才智之士擔任重任，而且整個政府，尤其握有政治領導權的最高機關，更要排除群眾的操縱。法西斯主義者對領袖的產生方式，僅輕描淡寫的認為他就是自然地存在。自然產生的領袖是人民的良知，本能地了解人民的需要，知道人民幸福的所在。像各地張貼標語所保證的：「元首永遠正確」，領袖所作的決定必然準確、萬無一失。因此領袖只能受道德及自然法的限制了。

除了以黨領國，黨國一體的統治型態是實踐法西斯主義的特徵外，在極權的國家中，統治者通常要建立二支軍隊：一支正規軍用來對付外敵，另一支則用來控制人民。希特勒從創黨之初就模倣墨索里尼的「黑衫黨」，組織「衝鋒隊」(*Sturmabteilung*; Storm Troopers, SA; 俗稱「褐衫隊」) 做為執行領袖意志的武力先鋒隊，¹⁷不久又創「黨衛隊」(*Schutzstaffel*, SS; 俗稱「黑衫隊」) 負責監視和鎮壓一切敵視納粹黨的活動，並迫害猶太人。奪取政權後，納粹政權更透過「蓋世太保」秘密警察(*Gestapo*; German secret State police of the Nazi regime) 等公安組織，來打擊異己，全面監控社會，並肆無忌憚地執行搜捕、暗殺以及種族滅絕等恐怖政策。

法西斯主義國家除了透過黨、政、軍及公安組織全面控制人民的活動外，尤重宣傳，也全面控制了所有宣傳工具。黨透過各種「國家的意識型態工具」，將領袖的意志灌輸於老百姓(Poulantzas, 1974:334-342)。¹⁸方法上除了銷毀異議的書籍及影片外，在壯麗與打擊頹廢的原則下，一切書籍、報紙、期刊、雜誌、小說、廣播節目、藝術創作與音樂總譜等，都成為政治化的文宣工具(Welch, 1993:23-49)。

在《我的奮鬥》一書中，希特勒繼承了鄙視一般群眾及愚民政策的宣傳手法，學著馬基維利(Niccolo Machiavelli)的口吻，強調宣傳是一種手段，堅信「謊言重複千遍就會成為真理」：「一切宣傳以通俗為要，宣傳的對象要針對教育程度不高的群眾...，群眾對象愈廣則理智內容愈應空泛...。群眾的理解力、辨識力、融合力都極為有限，而且也很健忘...。宣傳的內容所含的理智愈淺，所牽涉的情緒愈多，則所得的效果愈大。因之，一切有效的宣傳、標語、口號必須要能抓住要點，再三重覆...，而

¹⁷ 這個最初為防範左派政黨而創設的防衛性部隊，在希特勒強調「自衛的最佳方法就是攻擊」(Hitler, 1939:746)的指導原則下，成了攻擊性組織。

¹⁸ 有關法西斯主義與「國家的意識型態工具」，請參：Nicos Poulantzas, *Fascisme et Dictature*, Paris:Seuil/Maspero, 1974 pp.329-342。英文本：*Fascism and Dictatorship*,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且要把責任歸咎到敵人身上...，如此必能在群眾中發揮效果...。不論是商業或政治上的廣告，要能獲得成功的原因，都是在其持久性及一致性...」(Hitler, 1939:232-240)。希特勒一向認為群眾的心理簡單，接受大謊要較接受小謊更為容易：因為群眾自己經常為細微事故造作小謊，而且一般人也無能力與膽量去捏造大謊；因此，即使後來有人以真相相告，他們依然會懷疑，而繼續相信其中必有真實部份。

法西斯主義如同其他極權文化，其內容必須要靠慶典、集會來充實，並替代尚未研擬完整的計劃，同時也要靠滿街教條化的精神標語去教化群眾。無論是墨索里尼或是希特勒，最初都是從社會主義政黨習得組織與宣傳的手法，更嫻熟地應用到發動群眾運動。義大利的法西斯黨或德國的納粹黨都精於安排群眾集會，也有軍事化的組織動員能力。在細心編導的群眾集會中，精心的導演讓色彩壯麗和雄偉壯觀的場面，以及歌頌愛國歌曲的激昂氣氛，感動群眾，激發集體興奮。情緒受到感染的群眾，面對著象徵權威和榮譽的舞臺，在內容浮誇、語句煽動的講詞，以及愛國口號的激勵下，陷入到一種「群眾催眠狀態」(mass hypnosis)，迅速爆發出「集體不可抑制的歇斯底里興奮狀」(collective hysteria)。此時，群眾的情緒超越了理性的束縛，對於行動的指示，陷入一種集體接受，同時又是極端激動、吶喊、喝采及不能自制的興奮狀態。結果「連卑賤渺小的人都傲然自得，燃燒出無窮的信心...，不僅令人勇氣大增...意志堅定，同時也增加了團隊精神 (Hitler, 1939:715-716)。19

法西斯主義的群眾集會，所要激發的是效忠領袖及獻身報國的意念。法西斯運動以「集體興奮」為領袖與群眾的溝通模式，而領袖有激發群盲大眾狂熱的效果。法西斯主義者認為領袖是集體心智的導航器，人民對領袖就如同無意識對有意識。人民對領袖只有信任及服從，且隨時準備在他的英明領導下獻身於戰鬥。

實踐法西斯主義的結果，確有一段時期，這些社會因為走向極權政治而受益，也帶來一時的效率與經濟起飛的成果：如義大利的公共工程就頗造福大眾；德國在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八年間，經濟迅速復甦、失業人口銳減，人稱「經濟奇蹟」出現(Frei,1993:71-77; Meinecke, 1967: 70-77; Shirer, 1960: 258-262)，20同時相較於其他歐洲國家，其武裝部隊也快速地擴張且裝備精良。

法西斯主義的全民動員、服從、效忠，靠著戰爭也徹底展現出他的威力。尤其法西

Judith White, London: NLB, 1974.

19今天雖然有很多社會心理學家不太同意法國群眾心理學家雷鵬(Gustave Le Bon,1841-1931)的看法，但他的學說確實影響了法西斯主義者對群眾的了解。雷鵬在《群眾心理學》(*La Psychologie de la foule*)一書中，將溶入群眾中的人比擬成「受催眠的人」，有時不僅理性遭受破壞，表現出原始人的暴烈與兇惡本質，同時也會不由自主地做出一些對自己以及社會利益相違背的行動。

20 到一九三八年時，失業人口從一九三二年的五百六十萬人，降為四十二萬人。一九四〇年時降為五萬二千人(Frei,1993:71-72)。

斯主義的極致——納粹主義，確實彰顯出思想的力道。一九三八年三月，納粹德國併吞了奧地利；同年秋季，近乎一槍未發就佔領了捷克的蘇台德地區；翌年又入侵波蘭，迫使英、法二國對德宣戰。一九四〇年四、五月間，先後襲擊挪威、丹麥、比利時、荷蘭、法國，全是所向無敵的局面；同年六月，德軍已在巴黎凱旋門前舉辦慶典，炫耀納粹帝國的征服實力。深究其勝利的原因：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三七年間，希特勒納粹黨在政治上的精心籌劃，以及尚武的精神均發揮了作用，當然希特勒對敵人政治、軍事上的傑出洞察力也是主要原因。

但是反觀神氣活現卻不堪一擊的義大利軍隊，則是令法西斯主義者洩氣的例子。相對於希特勒所領導的納粹德國的節節勝利，頻頻戰敗的墨索里尼將過錯歸咎到他的國人，斥罵中經常以輕蔑的口吻評論說：「自十六世紀以來，一直當鐵砧的民族，是不可能幾年內就變成爲鐵錘」；「我對我們義大利民族沒有信心…，義大利民族是綿羊般的民族。十八年的時間不足以改變他們，這得需要一百八十年，也許一百八十個世紀」(Hibbert, 1972: 44, 100)。雖然義大利人在戰爭中的表現令墨索里尼洩氣，但他卻依賴法西斯主義在義大利掌權了二十年。

六、癡狂與黷武

納粹德國承襲著一道極盛的種族主義先驅思想，這也使得納粹主義成爲法西斯主義極偏激類型的最重要原因。精神上，「種族的迷思」(myth of *volk*)深深受到黑格爾(George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費希特(Johann Fichte, 1762-1814)、席林(Friedrich von Schilling, 1775-1854)、華格納(Richard Wagner, 1813-1883)、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及義大利熱情、浪漫主義革命家馬志尼(Giuseppe Mazzini, 1805-1872)等人作品的激發，形成了種族崇拜。²¹

希特勒的種族理念也受到「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的啓發，以及戈比諾(Joseph Arthur de Gobineau)、拉普熱(Uacher de Lapouge)、尚貝蘭(Houston Stewart de Chamberlain)等學說的鼓舞，將種族不平等的主張做爲德國「國家社會主義」的重要內涵，進而窮兵黷武地發動征服之戰(Touchard, 1981: 812)。

從十九世紀以來，爲數可觀的學者認爲西方社會是由亞利安人與閃族人二相較量，

²¹ 像黑格爾所處的時代就是受拿破崙侵略的時代，因此在他的早年著作中，處處表現出對德意志帝國復興的熱望以及國家至上的觀念。他的政治哲學是日耳曼理想主義唯心論(German idealism)的代表。受希臘哲學的影響，日耳曼唯心論派(German idealists)採取了一種觀點：認爲政治哲學在本質上是一種倫理的學問，並認爲國家的目的是道德的，即使人民過有德行的善良生活。

是毋庸置疑的事實。但就是因為如此，西方社會中產生了一種反猶太民族（anti-Semitism）的情緒，認為這群雖無祖國但卻又頑強又有致勝能力的民族，是特別不吉利的族群，不僅寄生在異族的國家，借用國籍自成一個族群，發揮求存的本能，同時也暗中尋求摧毀其宿主之道：如宣揚平等主義，獲得參政機會，以增長自己的勢力（Carsten, 1980: 23-31）。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一書中，就沿襲了這種看法，並說明了為何對猶太人至感厭惡並誓不兩立的原因。希特勒認為那些寄生在到處都是的猶太人，處處表現出陰險狡詐、虛偽詭辯的猶太精神。這些異族的寄生蟲——猶太人，總是在某一個國家之內自成一國，敗壞了原有的優良文化：猶太人的精神散佈在新聞、藝術、文學及戲劇各方面，製造出「精神的黑死病」來殘害他們所寄居的社會。令希特勒十分驚訝的是，不僅政府官員、國會議員、工會書記充斥著猶太人，重要的政黨（如當時的社會民主黨）、社會團體及新聞界也都被猶太人所操縱；同時在商業界更是厲害，已到了少不了猶太人的地步；但需要捍衛國家時，在前線的猶太人則寥寥無幾。²²

種族主義理論的始作俑者是法國人戈比諾（le Comte Joseph-Arthur de Gobineau, 1816-1882）。在《人類種族之不平等》（*Essai sur l'inégalité des races humaines*, 1853-1855）四卷書中，戈比諾強調：種族的優劣決定了文化的高低。戈比諾將人類分為三大種族：白種人、黃種人及黑種人。他認為三大種族中，最純的白種人種就是亞利安人（Aryan）。守秩序、重榮譽且個性堅毅、勇敢、進取的亞利安人，乃是人類中最優秀種族，也是世界上自然的統治者。而在亞利安人種中，至今尚未被異族血統混雜的是身軀高大、金髮藍眼的日耳曼族（Shirer, 1960: 103-104; Burleigh and Wippermann, 1991: 27-28）。英裔德籍的尚貝蘭（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 1855-1927）也贊同此一說法，只不過捨「亞利安人」這一名詞，將稱頌點集中在「條頓人」（Teuton）的高貴上。²³納粹的種族主義將戈比諾、張伯倫等人種族不平等學說納入，奉為科學論證，深信亞利安種族中的德意志人將統領世界。

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也強調：「舊文明與舊帝國覆亡的原因，並非是因為戰爭的失敗，血統混雜所造成的種族墮落，才是走向衰竭與滅亡的唯一原因」（Hitler, 1939: 405-406）。納粹黨的御用種族理論家羅森貝格（Alfred Rosenberg），在其一九三〇年出版的《二十世紀的迷思》一書中，進而倡言二十世紀的迷思乃是血統的迷思，認為人類的歷史就是一部種族鬥爭史（不是馬克斯主張的階級鬥爭史），尤其是創造一切優秀文化的亞利安人與其他劣種人種間的鬥爭史。以歐洲北部為發祥地的亞利安人，曾到過埃及、印度、波斯、希臘與羅馬，創造了這些地區璀璨的文化；然隨著

²² 希特勒對猶太人的仇恨感，請參希特勒《我的奮鬥》，上卷、第二章「在維也納苦學的日子」及第十一章「民族與種族」。

²³ 也有些人種學家習慣以「北歐人」（Nordic, 或譯為「瑠狄克人」）稱之。

時間的演變，亞利安人與當地人種通婚混居的結果，便逐漸沒落，羅馬就是典型的例子。至今，歐洲國家在科學、藝術、哲學、社會制度等方面仍然先進，就是「文化的創造者」亞利安種族中條頓族的傑作。現今只有條頓族仍保持著亞利安的純潔血統，因而優秀民族必須儘其所能地保持血統之純正，尤其要消除寄生蟲般的反種族人羣——猶太人，以及猶太人的民主政治與平等主張。羅森貝格認為：資本主義、馬克斯主義等都是猶太人的毒素，這些思想與社會體制都腐蝕了亞利安人(Fest, 1970: 167-168 ; 170-171)。²⁴

此外，從十九世紀末以後，出現一種新的見解：認為西方人在生理上出現衰退現象。原因來自兩方面：首先，醫療的進步延長了不健康者的生命，同時也讓後代子孫們傳遞著同樣的惡疾；其次是，多樣的社會補助，讓酗酒者、罪犯、邊緣人等社會寄生蟲得以存活。在二種因素交互作用下，容許腐劣份子繁殖子孫，讓身心與道德上的缺陷和腐敗因素遺傳，不僅貽害社會、且流毒後世。其結果將使歐洲很快成爲一個巨大的醫院(Million-Delsol, 1991:86)。因此納粹黨主張「優生主義」(eugenism)來改善人種的品質。

當時，納粹黨的種族主義及優生政策的主張並未引起責難的原因，就是這些論點早在十九世紀末就頗爲流行。因此，希特勒在這方面並不是一位思想家，納粹黨也只不過是一群執行者而已。

由於德國被認爲是種族最純正的唯一國度，爲了保持種族永續的純正，首先在納粹黨的主導下推展「優生政策」。納粹黨的優生主義原則首先應用在心智殘障者身上，他們是實驗瓦斯營的第一批受害者：約二十萬成年人和小孩被毒死(Burleigh and Wippermann, 1991:136-167; Frei 1993:120-128)。納粹政權也禁止殘廢及不正常者生育：一九三四年起，約有三十萬人被醫生所組成的「優生法庭」判決強制絕育(Frei, 1993: 122)。納粹德國並進而將猶太人予以隔離，進行淨化政策，將「腐蝕種族純潔」的猶太人進行清除工程——「大屠殺」(the Holocaust)(Kershaw, 1985:82-105)。

納粹主義爲了追逐完美社會，而消滅社會一部份成員。結果，恐怖成了統治的方法。對此，希特勒從未隱藏他的計劃，納粹主義的主張早就毫無忌憚地廣爲流傳，從未有要欺騙輿論的打算，完全是驕傲而又非常鎮定地公開執行。事實上，當一九三四年希特勒發佈有關優生法令時，還受到國際學者，尤其來自美國及英國的稱讚(Million-Delsol, 1991:88)。

²⁴ 可笑的是，這個時代的種族論者，在鄙視猶太人之餘，有時爲了方便竟宣稱耶穌、保羅都不是猶太人（像Chamberlain），而是亞利安或條頓種，就如同歷史上的名君、聖哲、藝術家、冒險家及英豪皆爲條頓血統；更令人可笑的是從防範黃禍到鄙視日本人爲「黃鬼」、「藝猴」的德國種族論學者，一旦在日本加入軸心國後，御用學者根泰(Hans K.F.Günther)竟立即發現日本人祖先有瑠狄克血統！（浦薛

而且，吾人必須要注意取得政權前後，令人目瞪口呆的演說家與忠實的群眾之間的關係。研究舊法西斯主義的重點不僅在它所造成的結果，更重要的是輿論對它的支持，及道德良知上的失明。走上法西斯主義的國家，選民不僅投票表示支持法西斯政黨，而且當取得政權並照計劃實踐了限制自由的措施時，人民仍然認同。從納粹黨獲得44%的選票主政以後，希特勒不時地透過全民投票來尋求人民的認同，而且先後獲得95%，84%及98.8%的支持(Million-Delsol, 1991:94)。在進行這些全民表決的過程中，德國先後推行了優生計劃、軍事教育、暗殺政敵及追捕猶太人等大膽作為。即使考量到人民多少受到恫嚇或計謀的安排，但老百姓與極權獨裁者之間的默契與勾結行為是毋庸置疑且令人困惑。這種串通雖然不是歷史上的頭一遭，但是一個如此受過教化的民族怎能製造出這種殘禍。可能的解釋是：受到鼓舞的集體行為本身消除了人們的疑慮；一連串的恐怖行動，必須要靠更殘忍的恐怖來支撐。法西斯主義者所展現出的，完全是當時人民的不滿，但是人民無法立即思辨出，此種思想過致所會帶來的可怕後果。

從自我偏執在「種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的自大心態，走向倡導病態的種族主義結果，很容易導引社會群盲大眾奔向窮兵黷武之途。生存鬥爭的信條，賦予了戰爭神聖的價值，而這種意識型態只能靠著戰爭來自我辯護。

法西斯主義窮兵黷武的氣焰，夾雜著追逐昔日光榮的野心，引領同胞帶動空前血腥、殘暴、野蠻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在病態的自大種族主義激勵下，納粹黨也推展了駭人聽聞而又最可恥的淨化種族行動，進行清除猶太人及所謂的劣等種族（吉普賽人、斯拉夫人及同性戀者）。²⁵最後，義大利與德國在法西斯主義的引領下，進入廢墟，也造成歐洲喪失了一千六百萬人的生命。在由希特勒帶頭，為淨化種族而設的「納粹集中營」(Nazi Concentration Camps)中，就系統化地（瓦斯營）處決了九百萬人，其中六百萬是猶太人。然法西斯主義的極權政體，不是因為來自內部的反抗，而是一直要到一九四五年因軍事上的失敗而瓦解。

七、結語

在思考或研究政治問題時，認為人總是會從理性的動機出發，很理智地參與政治的活動，是極端錯誤的想法。事實上，人們大都是憑著本能及自私的見解與推論，形成各自的政治態度。理性並不像人們所想像的那樣可指導人的意志與心靈的運作，理性在人類活動中所扮演的角色是次要的。本世紀的二次世界大戰就充分暴露了人的原始本性。

鳳,1963:232)

²⁵ 對猶太人及劣等種族之迫害(persecution)，請參：Michel Burleigh and Wolfgang Ippenmann, *The Racial State: Germany 1933-194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art II.

人會偽裝自己、隱瞞真相，甚至自己欺瞞自己。人性中存在著一種「本惡」(radical evil)，當它逃脫規範的束縛後，就會導致害人害己的結果。²⁶人們為了減輕生存之苦，總是會讓別人多受折磨。人雖異於一般禽獸，有追尋完美的可能性，但卻常常是選擇了混亂與毀滅。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思想的中心主張就是更悲觀地指出：人甚至不是自己軀體的主人。

柏拉圖就一直強調：政治社會內的種種困難，並非僅僅是因為教育不完善或經濟匱乏等因素所造成，問題是整個社會大眾及人性本身存在著毛病。柏拉圖在其後期作品《法律論》中的思想轉向——從早期的人治主張改為強調實行法治，就是明顯地表達出對人性脆弱的一種讓步(Sabine, 1961: 54-55)。

法西斯主義或納粹主義的政治福音，信仰思路雖粗俗，然其所以能引導群盲大眾癡狂的原因，「乃是情緒而非道理」(浦薛鳳, 1963: 113)。墨索里尼與希特勒迎合人民生活上的恐懼與偏見心理，以及沮喪的情緒，以任性任情的奔放，滿足了野蠻與不理性的本質，因而迅速地奪得了政權，同時也激勵出自大與仇外的行動，並進而引領百姓到荒誕的境地。事實上，無論是希特勒或墨索里尼的獨裁權力，都是體現了當時人民的意志，若非如此，人們也不會跟隨他們二十多年。

現今，法西斯主義在歐洲各地死灰復燃，已儼然成爲一股不容忽視的政治勢力，同時也爲舊法西斯主義所釀成的戰爭災禍推卸責任。²⁷由於有過迅速竄升、奪得政權的前車之鑑，因此人們不得不防範，人類的本惡有再次集體逃脫規範、再事肆虐的可能。因此辨別出新法西斯主義崛起的社會病因，有效整治促其重生的社會難題與困境，正是維護社會健康之道。

參考書目

- Albertoni, Ettore A. (1981) *Histoire des Doctrines Politiques en Italie*, Paris: Press Universitaire de France.
- Arendt, Hannah (1951)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²⁶ 「本惡」(radical evil)是德國悲觀主義哲學家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 1788-1860)所喜歡使用的字眼。

²⁷ 今天德、法地區的新納粹分子企圖篡改歷史，認爲只有戰爭時期所造成死傷，否認有所謂種族滅絕的「大屠殺」行動。相關問題請參：Roger Eatwell, "The Holocaust Denial: a study in Propaganda Technique", in *Neo-Fascism in Europe*, Edited by Luciano Cheles, Ronnie Ferguson and Michalina Vaughan, London: Longman,

- Baradat, Leon P. (1991) *Political Ideologies: Their Origins and Impact*, Englewoods Cliffs (N.J.):Prentice Hall, 4th ed..
- Broszat, Martin (1981) *The Hitler State: The Found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the Third Reich*, Translated by John W. Hiden, London : Longman House.
- Burleigh, Michael and Wolfgang Wippermann (1991) *The Racial State: Germany 1933-194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uzzi, Paul (1991) "Le Front National: entre National- Populisme et Extremisme de Droit " in *Regards sur l'Actualité*, Mensuel N. 169, Paris:La Documentation Française.
- Carr, William (1986) *Hitler: A Study in Personality and Politics*, London : E. Arnold.
- Carsten, F.L. (1980) *The Rise of Fasc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lifornia Press, Second Edition.
- Cheles, Luciano, Ronnie Ferguson and Michalina Vaughan (eds) (1991) *Neo-Fascism in Europe*, London : Longman.
- Chevalier, Jean-Jacques (1962) " Les Tendances Politiques " in *Les Grands Courants de la Pens é e Mondiale Contemporaine*, Tome 2, Milan:Marzorati, pp.1477-1540.
- Fest, Joachim C. (1970) *The Face of the Third Reich: Portraits of the Nazi Leadership*,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by Michael Bullock, London : Weidenfeld & Nicolson °
- Frei, Norbert (1993) *National Socialist Rule in Germany: The Führer State 1933-1945*, Translated by Simon B. Steyne, Oxford: Blackwell.
- Friedrich, Carl J. and Zbigniew K. Brzezinski (1956)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 Praeger, reprinted 1965.
- Fulbrook, Mary (1992) *The Divided Nation : A History of Germany 1918-1990* ,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eary, Dick (1993) *Hitler and Nazism*, London : Routledge.
- Griffin, Roger (1993) *The Nature of Fascism*, London:Routledge.
- Hibbert, Christopher (1972) *Mussolini*, New York:Ballantine Books Inc..

- 中譯本:鄭向黎譯《墨索里尼:軸心國的狂夫》,台北:星光,民國八十四年初版。
- Hitler, Adolf (1939) *Mein Kampf*, New York:Reynal and Hitchcock. (The German original : Munich , 1925、1927)
- Kershaw, Ian (1985) *The Nazi Dictatorship: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of Interpretation*, London:E.Arnold.
- Kitchen, Martin (1976) *Fascism* , London: Macmillan,Reprinted 1994.
- Kitschelt, Herbert, (1995) *The Radical Right in Western Europe : A Comparative Analysis*, Ann Arbor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Krejčí, Joroslav (1991) "Concepts of Right and Left ", in *Neo-Fascism in Europe*, edited by Luciano Cheles, London: Longman.
- Lavroff, Dmitri-Georges (1978) *Histoire des Idées Politiques: Depuis le Dix-Neuvième Siècle*, Paris:Dalloz, deuxième édition.
- Meinecke, Friedrich (1967) *The German Catastrophe*, Translated by Sidney B. Fay, Boston:Beacon Press.
- Michel, Henri (1987) *Les Fascismes*, Paris:P.U.F., coll.《Que sais-je?》, quatrième édition. 中譯本:黃發典譯《法西斯主義》,台北:遠流,民國八十二年年初版。
- Million-Delosol, Chantal (1991) *Les Idées Politiques au XX Siècle*, Paris:P.U.F..
- Milza, Pierre (1987) *Fascisme Francaise, Passé et Present*, Paris: Flammarion.
- Poulantzas, Nicos (1974) *Fascisme et Dictature*,Paris: Seuil /Maspero.英文本: *Fascism and Dictatoship*, translated from the Freuch by Judith White, London: NLB, 1974.
- Prélot, Marcel et Georges Lescuyer (1980) *Histoire des Idées Politiques*, Paris :Dalloz.
- Sabine, George H. (1961) *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y*, Hinsdale (Illinois) : Dryden Press, fourth edtion revised by Thomas L. Thorson,1973.
- Shirer, William L. (1960)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 :A History of Nazi Germany* ,New York : Simon and Schuster °
- Sorel, Georges, (1907) *Réflexions sur la Violence*, Paris: Ressources,

- 1981.
- Sternhell, Zeev (1987) "Fascism", in *The Blackwell Encyclopaedia of Political Thought*, Edited by David Miller, Janet Coleman, William Connolly and Alan Ryan, Oxford: Basil Blackwell, pp.148-150.
- Touchard, Jean (1981) *Histoire des Idées Politiques: 2/Du 18 siècle à nos jours*,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 Welch, David (1993) *The Third Reich: Politics and Propaganda*, London: Routledge.
- Wilkinson, P. (1987) "Fascism", in *The Blackwell Encyclopaedia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王皓昱 著 「追逐理想國: 政治福音的功能」, 《東吳政治社會學報》, 第十三期, 民國七十九年三月, 頁117-151.
- 巴尼斯柯爾等著, 周毓英編譯《法西斯主義的理論基礎》, 台北: 帕米爾, 民國六十六年台灣初版.
- 朱庭光 主編, 李巨廉、陳祥超、孫仁宗等著, 《法西斯體制研究》, 上海: 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五年版.
- 克里斯多弗·希伯特(Christopher Hibbert)著, 鄭向黎譯, 《墨索里尼: 軸心國的狂夫》, 台北: 星光, 民國八十四年版.
- 浦薛鳳 編著 《現代西洋政治思潮》, 台北: 正中, 民國五十二年台初版.
- 敬樂然 編 《希特勒、墨索里尼言論集》, 台北: 帕米爾, 民國六十五年台初版.
- 墨索里尼著、錢九威譯《法西斯主義: 理論及制度》, 台北: 帕米爾, 民國六十六年台灣初版.

European Old Fascism : Political Gospel and Collective Hysteria

Hao-yu Wang

When political thoughts become doctrinal beliefs and evangelical preachings , we here propose a generic term for them, "political gospel" .The political gospel is a hope,a goal,a faith,it is passion.It can unite and motivate the masses and channel them to pursue an ideal state.

Fascism was a pan-European phenomenon.Today ,neo-fascism is resurgent.This paper intends to analyze the European old fascism in its sociological context,and to debunk the fact of political gospel.

Keywords : Political Gospel, Fascism, Nation-Socialism, Nazism, Radical Right-Wing, Rabble-Rouser, People's Community, Totalitarianism, Ethnocentrism, Xenophobia, Anti-Semitism, Collective Hysteria, Holocaust.